

居延汉简是否去过长沙

沈亚明

1938年1月15日,不完全知实情者陈君葆,在唯一知真情者沈仲章揭开谜底之前,以为吴景桢带去长沙的“东西”是汉简,记下了当日所闻所猜。没想到约八十年后,被当作史实而“肯定”。

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瑞典团员贝格曼(Folke Bergman),在中国西北地区发掘出一万余枚汉代简牍。这是首次大批量出土的汉简,依古地名而称作“居延汉简”,被公认是东方考古的重大发现。

2017年听闻一个新“发现”,说在1938年,一部分居延汉简去过长沙。这是误判,必须尽早纠正,是以为文。

从北大到香港的路线

本节简介在1937年夏,居延汉简被及时运出北京大

学,半年后1938年初抵达香港的大致过程,以及停靠地点。

1931年,居延汉简由出土地区运到北平,归考察团理事会保管。为便于研究和摄影,转存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父亲沈仲章时任北大助教,兼任理事会唯一干事,为汉简摄影。1937年7月底,日军入侵北平,立即派兵把守北大。父亲独自黑夜翻墙潜入侦察,见迹象汉简极可能被毁,也担心日后被夺。于是当机立断,请助理周殿福帮忙,悄悄走边门进屋,将汉简逐根包裹妥当,分几次运出北大。先后转

藏,都不觉得安全。父亲根据万余枚汉简及多层防护所需体积,定制了两个储简大木箱。将汉简装箱封实后,存入德资银行的保险柜。【以上汉简在北平。参见拙文《沈仲章与居延汉简在北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古今论衡》第28期,2015年,第90-101页。】

父亲带着存单离开北平,8月12日到天津。父亲通知已转移到后方的徐森玉,数月后徐来津相会。徐森玉传达傅斯年等学界领袖人物的决定,指示沈仲章单人负责,南运汉简至香港。父亲再回北平,将

两个储简箱托运到天津,留存于托运行。【以上北平——天津。参见《沈仲章抢救居延汉简历险记》(简称《历险记》),署名为“沈仲章口述、霍伟记录、胡绣枫整理”,1986年首发于《团结报》,同年《人民日报》(海外版)和《文物天地》相继转载。我手中无文本,刊载月日不能确定。刊发前父亲未作校勘,小有差误。本节概述均据多次亲闻和笔录,不另注。】

12月底,两个储简箱被当作货物托运,上了海轮恒生号。父亲随船南下,结识了船长,随身皮箱放船长室。恒生

轮终点是香港,中途停靠青岛装货。父亲上岸给徐森玉发长电,请他香港接应。不料日军逼近青岛,船长接急令提前启锚。父亲回到码头,船已不见踪影。【以上天津——青岛;汉简未下船。】

父亲马上回城内发海上电报,请船长抵港时,将船长室的皮箱交给乘客吴景桢。吴是北大理科毕业生,一向佩服沈仲章。这次船票又是沈为吴弄到的,因此沈托之事,一定照办。父亲又电告徐森玉,告知脱船,请他接吴。因海上电报

(下转9版) ➡

← (上接7版)

放心”。而叶慈的《中国青铜器与中国艺术》(1925)则“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国人研究的介绍上,铭文一章从《说文》谈起,谈到铭文内容的形式分类”。最后的评价是:“这么周到的书,想必在当时起了很好的启蒙作用吧。”

美国的部分,林巳奈夫先生说:“在美国,富田幸次郎担任东亚部副部长的波士顿美术馆(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也搜集古铜器。”据考,富田幸次郎自1911至1931年担任东亚部副部长、1931至1963年任部长。他的职位,是因为他的前任冈仓天心的介绍。冈仓天心先是担任波士顿美术馆的顾问,1911至1913年任东亚部部长,在任期内为波士顿美术馆购买了几十件中国青铜器。由于他的努力,还促成了在日本名古屋也有一座波士顿美术馆。在那个时代,美国尚无人理会中国青铜器。因此可以说,冈仓天心最早介绍中国青铜器给美国,为美国人作了中国青铜器的启蒙。这段历史,在我所寓目的中国青铜器学术史中,似乎罕有提及,因此值得补述。

林巳奈夫评价高本汉的研究方法:“他采用的断代标准,和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吴其昌《金文疑年表》一样,是铭文。众所周知,高本汉是中国语言学家,阅读中国人的著作毫无困难,因此马上就用了新颖的方法。(原注146:这就是与滨田、梅原等我们的老前辈不同之处)

就是说,从铭文里得到断代的根据,进而找出殷、西周等各期有特色的器形和纹饰因素。”

对于高本汉的成就,林巳奈夫评价说:“如此具有系统性的研究,不用说当时,至今也没有第二个。高本汉在这方面的研究,对欧美学者作出的贡献极大。”这可以说是不吝笔墨的赞美了。

然后,林巳奈夫就开始批评高本汉的缺点了。“高本汉的思考逻辑性极高,而且缜密、周到,但可惜的是,他的缜密思考有时出现很大的漏洞。”举例为,高本汉一方面批评别人以族氏铭文和天干祖先名的有、无来区别殷、商器物的做法错误,另一方面,高本汉自己又认为“亚”字形、“斝子孙”、“举形”乃商器所独有。又举例,高本汉将商周铜器纹饰分为A、B、C三类的预设前提有误,“也是高氏酷爱逻辑的性格带来副作用的一个例子”。

关于纹饰的研究,林巳奈夫连续批评了好几位西方学者的研究。林巳奈夫指出这些研究可以分为两类(讨论纹饰的意义和不讨论纹饰的意义)。关于纹饰意义的比较性讨论,他对于亨采(Hentze)的研究,说“比较对象所属的文化之间的历史关系不明”;对于瓦特培里(Waterbury),则说她“囫囵吞枣地相信古籍的记载”、“方法太过天真”;若以世界民俗中神灵与商周动物纹相比较,“在采用这种方法之前,应该首先学习汉语,更加深入地研究中国本身的资料”(在214页又肯定她提出的“侧视形”观察法)。

他介绍了罗越(Max Loehr)的商代青铜器五型式说,及其后学的两三种论著,尤其是介绍弗吉尼亚·凯恩女士的两种研究时,说她第一种研究的前提是“金文与甲骨文字体平行演变”,“但谁都明白这个前提根本无法证明”。对于凯恩第二种研究“按照罗越先生的五种型式对安阳出土的文物加以分析”,这种利用某种学说来检验考古事实的做法,林巳奈夫先生毫不留情地指出“方法上就错了”。

《综览》第33页“作为二战后商周青铜器研究史上的重大事件,毛公鼎真伪问题的争论也有必要讲讲”。巴纳先提出毛公鼎真伪可疑的证据,然后郑德坤撰文反驳,虽然提出了甲骨文文的某些实例,但林巳奈夫认为他“对巴纳说的批评并非都是中肯的。例如李桢先生认为毛公鼎是真器,是因为自从毛公鼎出土以来中国的收藏者和学者谁也没有怀疑过其真伪。这只不过是根据权威作反对而已”。

我觉得林巳奈夫先生的这个态度极为重要。学术研究就是一定要讲个“理”出来,若只是援引权威,人云亦云,或者不屑一顾,那算个什么呢?我想,不相信权威,是《综览》整本书的重要立场。

林巳奈夫接下来谈到,直到张光远撰文谈到毛公鼎铭文中的阳文方格,“这对巴纳先生的伪器说是致命的意见”。之后又以自己的研究体会,讨论了阳文方格与伪器制造无关。

以上大概介绍了林巳奈夫《综览》第二章所见的学术批评。在其他各章的序说中,对某些研

究的甄别和评论,更为细致和精彩。例如,他说贝塚茂树和他自己都是因为读了王国维的文章,才走上学术道路,可是书中对王国维的批评,也实在是不少。又例如用了约9页篇幅,详细讨论了学界关于“复原历谱的尝试”,他说:“在开始具体讨论之前,有两个我们必须考虑,以往学者尤其中国学者却没有自觉地反省的问题:第一是方法问题,第二是资料的问题。”这部分的讨论不算很长,却都是“干货”,虽然今天依据新资料还有可以补充之处,但林先生的讨论,意欲抽掉历日断代法的两个前提,值得我们深思。

因为新资料的发现,林先生书中很多知识性的东西或许需要更新或补充,但林先生此书的最大好处是,这是独立思考而来的体系,讨论的都是一些基础性、原点性的第一流问题,这些问题不会过时,方法更不会过时。试举一例,林先生书中首先讲到商周青铜器的作用,他拈出古书记载中的“庸器”概念,谈到“青铜彝器的纪念物性质”,因我这几年致力于同样的问题,翻开书就看到林先生正文不多的几句话和两个注释,令我不免浑身一震,心中泛起一阵尊敬的涟漪。

林先生的传统文献学功底是非常好的,古文字考释方面也有过精辟的见解,例如他曾对旧释“郢爱”改释为“郢禹”,能发人所未发。《综览》所见的铭文研究都是类型学方面的,一是字体的类型学研究,一是铭辞格式的类型学研究。他认为,仅靠读懂铭文并不能追溯青铜器的变迁史,

因为“研究铭文的学者对器物的形制和花纹有一知半解的知识,这些很可能存在问题的知识,在其编年中起了一些作用”,鉴于此,仅作铭文研究者的这种成果并不能令人放心。这个批评也是很中肯的。

通观《综览》,可见林巳奈夫先生的理念,在于结合文献对青铜器的铭文、器形、纹饰等多种因素做类型学研究,目的在于编年,然后做历史研究。不过,我尚且不知道林巳奈夫在中国田野考古方面有何重要建树(据说他曾在日本和中亚做发掘),可以说,在我心中,这位日本的林先生是一位将大部分精力都放在类型学和文献学上的“沙发考古学家”,也有人说他多利用照片做研究,是“照片上的考古学家”,我并不觉得这算是嘲笑。在此,我想引用中国考古学界的另一位林先生——林沅先生对类型学的观点。林沅先生的大意是,类型学并非建立在地层学之上的方法,类型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研究相对年代的方法,其核心是排队,相关诸特征所排成的队是否平行,是屡试不爽的检验手段。我记得林沅先生还有一句话,似乎叫做“多发同至”,也是强调类型学上的多种特征应平行演变,不能仅仅依靠单一因素。林巳奈夫先生研究青铜器器形、纹饰、铭文等因素的时代演变,也是多管齐下,强调综合性、系统性研究的重要性。我觉得这两位林先生对类型学的理念是相合的。